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John Zysma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政府、市场与增长

——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

[美] 约翰·齐斯曼 著 / 刘娟凤 刘骥 译

政府、市场与增长 ——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

【美】约翰·齐斯曼 著 / 刘娟凤 刘骥 译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John Zysman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 / 朱天飏 执行主编 / 曹海军 刘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by John Zysm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3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eijing Sourcebook Agency.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72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市场与增长: 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 /
(美) 齐斯曼著; 刘娟凤, 刘骥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SBN 978-7-80720-707-8

I. 政… II. ①齐…②刘…③刘… III. 政府经济学 - 研
究 IV. 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868号

书 名: 政府、市场与增长: 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
著 者: [美]约翰·齐斯曼
译 者: 刘娟凤 刘骥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6.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20-707-8
定 价: 43.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

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础。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观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距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前 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发生了衰退。在很多国家,衰退相当的突然。经济状况的恶化在整个西方激起了一轮新的讨论,即讨论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由于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问题本身,因此对当前问题截然不同的解释为解决问题开出了大相径庭的处方。

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代经济困境及其在发达国家中引起的政策争论的解读。本书探讨了为什么控制生产和产品层面大量的微观变化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对经济增长又是必需的,以及为什么创造这些变化的努力遭遇的政治抵抗不断增强。本书的主要论点以分析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的政府行为为基础,试图解释“二战”以来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本书的论述集中在各个政府有选择地干预进而影响产业结果的能力,并试图解释干预能力和战略选择上的国别差异。本书认为,解决增长问题在技术上有三种不同的政治方案:国家主导、市场主导和协商。

在解释政府领导产业的能力差异时,有一点是本书的独特之处。作者认为研究国家的金融结构既能解释政府的经济战略,也能揭示伴随产业变迁的政治冲突。国家金融体系的特定制度限制了公司在市场中的选择以及政府的行政选择。也就是说,在每个国家,金融市场限定了经济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方式。金融市场的结构直接影响着政府主导

产业的能力以及经济目标带来的政治冲突。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变动的价格分配着商品和服务,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也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它是决定谁获得什么的一种方式。因此,通过追踪市场经济中货币的流动以及影响这种流动的制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源用于何处,哪些人在制定分配性决策,以及获得和执行控制的过程是什么。

所有的长期项目都需要资金来执行,需要朋友和同事的支持来完成。本书也不例外。本项目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德国马歇尔基金、外交理事会和加州大学。多年来,很多人给予了我支持和建议。在此要特别感谢其中几位。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苏珊娜·伯杰(Suzanne Berger)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鼓励和透彻的分析。只有当最好的朋友碰巧也是优秀学者时,有些人才能有所意识。在我们不断的讨论中,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让我更清楚地看到本书实际上想要做的是做什么。彼得·卡岑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明晰了本书的结构。那些与我合作进行部门研究的人让我一直关注于现实的经济而不是学术上关于“危机”的认识迷雾。部门研究见于《国际竞争中的美国产业》(*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这是本系列中的另外一本书。迈克尔·博勒斯(Michael Borrus)和詹姆斯·E. 米尔斯坦(James E. Millstein)帮助我进行美国经济的教学并且让我保持着对新问题的热情。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约翰·阿克曼(John Ackerman)以其耐心、智慧和熟练充分地理解了论点并将有些晦涩乏味的文字改写得更易理解。帕特里夏·洛克瑞(Patricia Lockary)使我的著作在整个项目中保持了连续性。她的编辑能力,得益于法律方面的实际工作,她对社会科学术语的熟悉和对模糊概念毫不留情的摒弃使得本书更精致。

约翰·齐斯曼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中文版序

本书是约翰·齐斯曼根据 John Zysman¹, Niels Christian Nielsen, Dan Breznitz¹, and Derek Wong (2007), “Building on the Past, Imagining the Future”, 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第 181 号工作底稿改写而成的。网址: <http://brie.berkeley.edu/publications/WP181.pdf>。

立足过去,设想未来

——数字化时代,以能力为基础的增长战略^①

《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一书讲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增长与竞争力问题。第一章描述了当时市场状况的特点。全书集中关注金融体系与制度,并且提出正是几种金融体系的性质塑造了商业集团—政府间关系的特征与政府拥有的战略选择。最初《政府、市场与增长》一书出版时,“二战”后的金融秩序刚刚建立,而且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保留着各自的独特性。本书描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各个国家不同的金融结构,即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构如何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政府的产业战略以及如何塑造了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本书提出:三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它们显然与不同的金融体系的特征密切相关。在法国和日本,国家主导的保守型发展模式是依赖于以信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协商型的模式是德国体系的特点,它依赖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在英国和美国,

^① 这篇序言是约翰·齐斯曼根据 John Zysman¹, Niels Christian Nielsen, Dan Breznitz¹, and Derek Wong (2007), “Building on the Past, Imagining the Future”, 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第 181 号工作底稿改写而成的。网址: <http://brie.berkeley.edu/publications/WP181.pdf>。

市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植根于以证券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

自此之后,各国的金融体系不断地演变。在过去的 25 年里出现了重大的发展变化,它们改变了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储蓄和投资的过程中,所有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德国体系的演变不仅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的市场导向,而且是因为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限制和机会。证券市场的机制在银行贷款中的重要性增加了,而银行在产业活动中的正式作用似乎降低了。然而,当德国主要的跨国公司能够在全世界市场上获得资金时,中小型公司却更加依赖银行。对于法国和日本而言,财富、储蓄和工业赶超意味着匮乏时期有选择的和指导性的资本分配机制与发展模式必须有所改变。日本的金融重组与市场泡沫以及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经济增长的崩溃交织在一起。法国人转向了市场导向的体系,但没有带来巨大的动荡。其中较大的金融事件是里昂信贷银行(Credit Lyonnais)的危机。法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相比于日本上万亿美元的坏账而言,这个数额就显得小很多了。法国金融改革还有另外的一项意义——它为欧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法国和德国控制货币供应的机制非常相似,这成为迈向欧洲中央银行的重要一步。在我看来,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本身。欧元的诞生对于地缘政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将刚刚统一的德国纳入了西欧。

本书的中译本现在出版了,而当下正值百年不遇的重大金融危机。这个危机源于英国和美国这两大政治经济体在金融技术和管理上的演变,二者都是以证券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在保护投资者避免风险的名义下将整个金融体系置于危机中。这部分源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再管制(re-regulation),部分源于通信技术给信息创造了巨大影响力。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日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以相互关联(interconnection)为特点。这里存在两种外部失衡,首先是从产油国的大规模进口,其次是进口亚洲生产国的制造品与信息 and 通信服务(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简称

ICT)。这两种失衡给后两者带来了巨大的储蓄和金融影响力。当然,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之外的主要金融国的崛起,以及国际金融活动的范围发生了改变。

近代以来出现了几大问题。第一,各国的金融体系在控制货币供应和公司融资上曾经有巨大的差异,现在这种差异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第二,现在核心的金融问题是控制风险和风险管理,以此维持健康的金融机构和稳定的金融体系。问题已经越来越无关如何通过金融体系的工具来执行政府的目标。作为金融参与者的国家在增长和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降低了,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当然,在有些地方,国家在积累储蓄、将储蓄转变为投资以及将投资导入生产性用途的过程中仍然直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市场与增长》一书可能为某些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当这些国家考虑如何影响现有的金融活动以及如何和何时引进更偏向市场和证券导向的制度安排时。

反思政府、市场与增长的关系对考察当前的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生产的急剧重组和 ICT 服务的出现以及金融市场本身的变化。新的变化包括生产的模块化、供应网络的跨国界分布以及服务活动的模式化和零散化。这些变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的核心议题,也是富有的发达国家在适应新的变化时的核心议题。因此,作为本书的序言,我选择了自己与另外两位同事,即亚特兰大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的丹·布雷斯尼茨(Dan Breznitz)与来自哥本哈根的尼尔斯·克里斯琴·尼尔森(Niels Christian Nielsen)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描述的这个竞争的世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二战”后的时期。《政府、市场与增长》一书描述的是“二战”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然而,过去的 25 年里,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转型,新的竞争环境产生了,它带来了全新的政策挑战。我自己对与增长和发展相关的国内金融战略的反思则开始于这些新的竞争条件。

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价值创造的逻辑已经改变了。针对增长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挑战所需的政府战略,本文的目的是阐述我现在对这

两种特征的解释。本文认为,竞争问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关注服务业的转型、生产的模块化,以及各个地方和公司为了有效地竞争而需要的能力的特征。政府传统而持续的政策目标仍是:维持就业与生产效率的增长,进而确保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获得成功的要求是,“在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社区(公司与民众)能够提供经得住国际市场考验的商品与服务,同时也能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①尽管目标未变,但仅仅提高属于民族旗舰的个别公司的竞争力或追求工厂式工业化显然过时了,只是对研发或教育进行投资也不够,无所作为更是等于衰落。各个地区必须想出新的战略,找到独特的优势来支持就业与生产活动。这些战略需要以能力(competencies)为目标,而不是针对个别公司或个别的产业部门。首先,我们认为对公司而言,全球市场的根本变迁改变了价值创造的逻辑与竞争的特征。其次,我们提出,对地区、国家,甚或社区而言,价值逻辑的变化也改变着政策选择与增长的战略。政策分析的焦点与基础必须是能力的领域。能力是公司各种活动的基础,而且是部门竞争优势的核心。最后,我们认为,战略上没有灵丹妙药,只有大量的选项和选择。成功的战略只有立足过去、设想未来才会出现。

一、价值创造的新逻辑改变了政策问题,尽管就业和生产效率的目标没变。价值逻辑的两个转变直接变成了公司竞争地位的核心以及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关键。因此,这些转变既创造了政策机会,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行为。^② 这两个转变是:生产的分解(decomposition of

① Cohen, S., Teece D. J., Tyson L., and Zysman J. (1984), "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 *President Commission on Competitiveness*, Vol. 3.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约翰·扬(John Young),时任惠普的首席执行官,此后创建了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② 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关于生产效率的突破性著作改变了关于如何找到生产效率以及资源是什么的观点。其论据相当具有说服力。如参见: Jorgenson, D. W., Ho M. S., and Stiroh K. J.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production)及与之相对应的来自各种新进入者的竞争的加剧;服务的转型,即随着其性质、组织与提供方式的急剧变化,服务业对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大大增强。^① 因此,公司要不断地寻找价值网络中的最佳位置与市场中的防御点。不断地寻找和适应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从设计和生产战略到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方案。^② 其中,对隐性互动(tacit interaction)的管理能力使公司能够有效地运用每个能力领域中包含的知识与认知,并且以完全创新的方式对这些能力领域进行结合或再结合。^③

(1)生产的分解

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再是由纵向整合的等级化公司来进行,这些公司往往集中在原地。^④ 现在公司更容易分解自己的业务活动,然后进行外包,而更具争议的是,在国外生产零件,又回国进行再装配,最后发货。^⑤ 这个生产分解的过程——指的是制造部门中的模块化与服务业

① Zysman, J. (2006), "The Algorithmic Revolution-The Fourth Services Trans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9, 7.

② 我们早期的研究表明,有些公司和地方,尤其是北欧国家,拥有独特的知识管理方式;这些方式与在高附加值生产中独特地使用技术劳工的方式结合起来;公司对于如何利用技术劳工的选择可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Zysman, J. and Newman, A. eds. (2006), *How Revolutionary wa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National Responses, Market Transitions, and Global Technology*. Stanford Business Books: Stanford. 尤其参见 Niels Christian Nielsen and Maj Nielsen 9 "Spoken About Knowledge: Why It Takes Much More than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Manage Knowledge") and Tobias Schultze-Cleven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A Research Note").

③ Manyika, J. (2006), "The Coming Imperative for the World's Knowledge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May 15 2006, 18. 他援引了麦肯锡(McKinsey)对于各种分支领域中 8000 家公司的研究。

④ "生产"的概念传统上是集中于制造业,现在已经扩大到包括软件和网络相关业务的生产。Zysman, J. (2003), "Strategic Asset or Vulnerable Commodity?: Manufacturing in a Digital Era", *BRIE Working Paper 147A*,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erkeley.

⑤ 例如英国的商业活动向国外转移,参见 Abramovsky, L., Griffith, R., & Sako, M. (2004), "Offshoring of business servic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UK economy",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Briefing Notes, BN51.

中的零散型服务(unbundled services)——是地理与组织方面的。^①例如,很多美国公司在同一家等级化的公司内部将业务放在印度。^②像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这样的印度公司则是它们外包和海外业务的渠道。

由于地点的分散,支持市场中的“国内与民族旗舰”公司的传统战略可能不会达到维护“国内”经济的目的。支持本国或本地区的公司往往给其他地方和国家创造就业与发展。关于海外业务的讨论起源于生产的分散。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就业,还有创新的核心地点。

与简单的生产链条相反,价值网络或生产模式的结构与服务的捆绑等概念意味着不断的重组和迁移价值创造的部分。^③波音公司(Boeing)与苹果公司(Apple)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创造了这样的网络,但是它们各自保留了核心的产品概念,至少现在是如此。每个子系统、模块、任务或零部件突然都变成了一种潜在的产品,并且在公司间和国

① 这个争论源于10年前。早期关于这点的著作包括蒂姆·斯特金(Tim Sturgeon)在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BRIE)的论文。例如 Sturgeon, T. (1997), “Turnkey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RIE Working Paper 92A*,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erkeley. ; Sturgeon, T. (1997) “Does Manufacturing Still Matter? The Organizational Delinking of Production from Innovation”, *BRIE Working Paper 92B*,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erkeley. 零散化的说法是 Richard Baldwin 普及的,见 Baldwin, R. (2006)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Finnish Prime Minister’s Office.

② 我们列出这个很长的清单:英特尔(Intel)、思科(Cisco)、高盛(Goldman Sachs)、强生(Johnson and Johnson)、惠普、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实际上,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商业周刊》列出的美国最佳的合作公司。

③ “价值链”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将供应商视为从属地位的范式。这种等级化的关系顺序无法描述全球经济的现状。现在,创新是分散的。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似乎每个环节和部分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过程中都有产生改变的潜在可能。价值过程的控制因此也变得很分散。因此,我们选择用“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一词而不是“价值链”的说法,后者与等级化的从属关系有关。